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WAI GUO XUE ZHE
PING MAO ZE DONG

第四卷



萧延中

主编

传说 的传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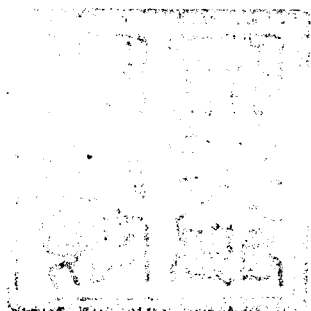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4 3645 4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四卷

“传说”的传说

萧延中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2784/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4卷：“传说”的传说/萧延中
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6
ISBN 7-5008-1912-9

I. 外… II. 萧… III. 毛泽东-研究 IV.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674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7-021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兴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500千字
印张：	21.375
印数：	4061~8094册(平)
定价：	28.80元(平)

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诸位
专家在审读过程中付出的辛勤
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会

顾 问：廖盖隆 林茂生 李君如
主 编：萧延中
副主编：王应一 何祚康 张惠才
 杨 德 唐秀兰

目 录

第九章 研究的回顾、评价和展望	(1)
导言.....	(1)
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3)
毛泽东、毛主义和毛学.....〔美〕勒内·戈德曼	(44)
西方毛泽东研究：分析及评价	
.....〔澳大利亚〕尼克·奈特	(60)
“正确”和“错误”：毛泽东研究以及对	
毛的政治思想重新评价.....〔美〕约翰·斯塔尔	(93)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美〕理查德·马德森	(101)
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	
.....〔澳大利亚〕尼克·奈特	(117)
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141)
当代中国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使用与滥用	
.....〔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181)
第十章 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论战	(209)
导言.....	(209)

- “毛主义”的传说 [美] 卡尔·魏特夫 (212)
- “毛主义”传说的传说 [美] 本杰明·史华兹 (250)
- “毛主义”的“传说”或“传说的传说”
——魏特夫和史华兹的结束语以及亨利克·夏德马对双方的评论
..... [美] 魏特夫复本杰明·史华兹 (260)
- “毛主义”的实质 [美] 亨利克·夏德马 (273)
-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与
马克思 [美] 理查德·费理察 (279)
- 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革 (上)
..... [美] 安德鲁·沃尔德尔 (315)
- 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革 (下)
..... [美] 安德鲁·沃尔德尔 (332)
- 再谈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一个答复
..... [美] 本杰明·史华兹 (364)
- 答复 [美]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375)
- 学院传统内的毛泽东和马克思
..... [美] 莫里斯·迈斯纳 (382)
- 马克思和毛以及 [美] 爱德华·弗里德曼 (387)
- 对中国问题研究中费理察与沃尔德尔
“革命”的一些思考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394)
- 卡尔·马克思、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发展的
辩证法 [美] 马克·赛尔顿 (409)
- 毛泽东与马克思 [美] 斯蒂芬·安道斯 (419)
- 关于毛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自我形象
..... [美] 约翰·斯塔尔 (425)
- 毛泽东与马克思：认识、学术与意识形态

——一点答复·····	〔美〕理查德·费理察	(432)
一点答复·····	〔美〕安德鲁·沃尔德尔	(441)
评论·····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448)
对座谈会上发表的论文的讨论与评论 ·····	〔美〕约翰·格利	(455)
附录 1. 本书部分作者简介 ·····		(475)
2. 毛泽东研究部分英文论著目录索引 ·····		(493)
3. 战后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论著目录索引 ·····		(555)
4. 国外毛泽东研究观点简介 ·····	萧延中 张惠才	(574)
5. Note On the Foreign Sources Used in the Books ·····		(666)
后 记 ·····		(673)

第九章 研究的回顾、 评价和展望

导 言

自本世纪50年代初期,国外学术界开始进行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论研究以来,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其中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有关毛泽东的专题论述明显减少,但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渐丰富,其研究格调也越来越向着严谨和深入的方向发展。从宏观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10年,尽管国外学术界也有像费正清、史华兹等研究专家的著作问世,但当时在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极右舆论的压迫下,对中国的研究,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直接受到了抑制和阻碍,被视为亲共的“异端”。1960年,现在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于英国创刊,第一、二期就刊载了著名学者魏特夫与史华兹之间关于“毛主义”的论战,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62年,由国外毛泽东研究著名专家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一版问世,该书中施拉姆不仅阐述了自己对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概括,而且翻译了若干毛泽东著作的原文,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毛泽东

研究的学术进展。随着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战逐渐公开化，加之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形成了美、苏、中三大国鼎立世界的局面，国外毛泽东研究也达到了高潮。研究论文无以计数，仅专著就有百种以上。可以说，当时国际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无一例外地都发表了各自的独立见解，以至于西方学者称这种状况为“毛泽东学”(Mao-Ology)。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至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与中国学术界的变化类似，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在观点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支持“文革”的理论逐渐销声匿迹，同时也开始了对30多年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这种西方学者的自我评价，大体上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事件、文献的重新考订，纠正了以往由于文献缺乏和交流不便所形成的错误；二是对各自论点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或加补充，或加说明，或论争，或修正。大部分学者都多少对“文革”时期的论点有所改动，有的学者，像史华兹，当时对“文革”的论点就较谨慎，持保留态度，也有的学者，像迈斯纳，则对学术领域中的见风使舵不以为然，坚守自己的一家之言；三是各种研究框架和论证体系的反思和完善。就我们所知，仅就毛泽东及其思想阶段的划分一项，外国学者中就有10种模式之多，各种模式都有相应的标准和依据。同时，他们还初步在众多研究中，抽象出诸如“思想史研究法”、“还原主义心理法”和“历史非连续法”等论述框架。对这些框架进行比较分析，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自我评价的内容之一。

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对其自身研究成果的评价，具有与中国学者不同的视角。由于方法论、价值观以及语言方面的差异，国外学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往往能给中国人若干意想不到的感触与启迪，同时这也是了解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重要补充。

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1976年夏，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提议下，《中国季刊》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批文章，对毛泽东生平和著作的各个方面进行论述。编辑部认为，这些文章应尽快完成，随时待发，以便在这位主席消失之后迅速适应形势，以专著的形式发表。因为，十分明显，毛的消逝已为期不远了。虽然，这一计划很快就被事实的实际进程所超越，但是稿件仍在1977年初全部写成。到了1977年秋，差不多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这本书问世了，书名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考虑到该书当时发表的情况，我要说，这部专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不错的——当然，我不是指其中我自己的那篇文章。然而，此书名虽说具有引人注目的效果，却显然是雄心过大了，那时，对于像毛这样一个重大人物，历史还没有作出它的裁决，也还不可能作出它的裁决。在这种应急的文章中，大部分作者只能依据他们在毛生前就已形成的观点，可是，他们同时又试图转移论述的中心去说明“毛泽东时代”已过去这一事实。结果，该书中的许多文章（这一次也包括我的文章在内）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像从一个运动着的参照系下拍摄而成的模糊快照。

毛泽东虽已不像 60 年代那样在中国和世界都以高大威严的形象耸立在人们眼前，但甚至直到今天，他还远没有在地平线上消逝，因此我们能够以客观的历史眼光来观察他。然而，尽管如此，在过去了的七年当中，使我们得以理解毛及其作用的背景，已经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中国人已经发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其中包括许多毛本人写的文章的原文。在这些材料中，有些是公开发行的，另一些在原则上仅供内部使用。不过，有时外国学者也被允许接触它们，而且其中有一些也已进入了中国之外的图书馆。因此，使我们能够系统地提出对毛的评价的资料基础已大大地扩大了。

其次，中国人不仅在利用这些新材料写文章，广泛地论述毛泽东及其思想，而且也对 1949 年至 1976 年在毛领导下所出现的事实进行再思考，对毛制定的、延续至今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再认识。

最后，由于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有可能使自己不再老是着眼于 10 年前盛极一时的文化大革命了，他们已经有可能对毛的一生的意义进行思考，而不是把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个事件（不管它是延安时期，还是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毛的模式范例或毛的经验总结。

本文的意图不是提出这七年来我本人对毛和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观点。我的打算是首先全面地考察一下这个领域内近年的文献，特别把重点放在本文前面所列举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毛逝世以来在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地方发表的。我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虽然也要对这些著作各自的优点和弱点作一些评论，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在通常的意义上评论这些著作，而是为了总结一下它们为我们对毛的理解增加了些什么，以及为了注意到对毛的解释的新趋向。在对我所了解的“毛的研究”的现状作出评价之后，我

将展望未来研究工作的前景，并就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对于我选来研究的著作的书目作一点说明，也许是必要的。选入这个书目中的大部分是《中国季刊》编辑部自1976年以来所收到用西欧语言写成的著作，不过，偶尔有二三本这样的著作未被选入，我将在后面提及。而《中国季刊》也已发表过评论这几本著作的文章。我略去了所有苏联作者的作品，原因是，虽然其中有一些作品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它们提出了关于对毛的解释的特殊问题。我也略去用日语发表的著作，当然，这些著作既丰富又重要。原因很简单，我在日语上只有极一般的知识，这对于实现本文的目的是不够的。尽管这个书目有些缺陷，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它的选书范围还是足够大的，足以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从而对于表明我们来自何方又将走向哪里是有用的。

本文的讨论是从两本叙述毛整个一生的著作开始的，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两本著作就是威尔逊的《毛：人民的皇帝》和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这两部传记。虽然，这两部传记的诞生相隔仅一年，而特里尔刚赶得上在自己的书中插入一句话提及威尔逊著作的问世：“一个英国记者写的一本材料颇丰的传记。”但这两本书在某些方面属于不同的知识界。如果说威尔逊的书读起来仿佛是在毛活着的时候写的，那么这并不是不公正的。“他为中国创造了一种生活、经济和政治的全新秩序。”这一秩序在威尔逊看来，几乎完全是一件好事。实际上，“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会因为毛在他有机会的时候没有用甚至更无情的手段强行推进他的计划而责备他，也会因为他在私人关系上的失败而责备他。如果毛能够把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这样的实验（这两个实验都具有振奋人心的积极内容），与更好地理解自己并乐于同他合作的同事结合起来，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会更加幸运了。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做到，对

于像毛这样一个伟人，人们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而特里尔的观点则比较具有怀疑主义特点。他一面总结说，毛的四分之一世纪的统治“重建了中国社会”，而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延续到未来”；一面又补充说：“如果毛早走 20 年，中国也许会更好些。”

除了这种在最后结论上的不同以外，这两位作者在处理他们在课题的方法上也非常不同。威尔逊的书实质上是一部关于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历史，而特里尔则比较注重与毛有关的戏剧性事件。这种差别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两本书叙述内容的不同比例上。威尔逊的书为毛一生的每一时期提供了相等的篇幅。而特里尔不仅对毛的在野年代（1927—1935 年）作相当简略的叙述，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对大跃进及其后果也只作相当简略的叙述。相反地，毛的最后 10 年却占去了本书篇幅的近三分之一（有 130 页是写 1966—1967 年这段时期的，与此相比，1958—1966 年只用了 43 页）。很明显，特里尔用这么长的篇幅，详细讨论了他认为属于毛的老年昏聩表现的事情，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在那些年代中是一个直接观察中国的人，而且还拥有许多在同外国政治家会见时所获得的材料。但主要的原因是，正是在这段时期中，毛本人的悲剧在他看来最为动人心魄。对毛和毛的内心思想的强调，也表现在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上：作者使用很短的段落，有许多段落仅一个句子，自始至终力求简练和富于启发性。

尽管有这些内容比例上的差别，两位作者对毛在 1949 年以前的生涯的叙述，大体是相同的，而且，实际上大部分是按照早先已有的传记所介绍的线索来写的。威尔逊和特里尔在讨论毛的前共产主义者时期的时候，都采用了麦克唐纳最先提供的关于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的材料；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未能利用自 1979 年以来可以在中国得到的关于毛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发展的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两位作者都纠正了以前的传记作者（包括我本人）的

一个错误，即以为毛 1935 年 1 月在遵义成了党中央主席；他们清楚地说明，当时毛的权力的基础在于重新掌握了军事领导。由于明显的原因，两位作者都未能详细叙述 1943 年 3 月毛被选举担任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最高领导职务，因为这一材料仅在 1980 年年中才在中国公布。威尔逊正确地指出，毛成为党的主席是在 1943 年夏天；但特里尔说，这只是 1945 年七大上的事。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虽然这两位作者都从毛发动整风运动的讲话中引用了几个语言生动的段落，但是他们都没有去考虑这场至关重要的运动的政治动力。这场运动直接为毛战胜他的竞争对手奠定了基础。

如果威尔逊和特里尔在叙述毛 1949 年以前的生涯时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他们对毛获取权力之后的时期则提供了彼此非常不同的图景。正是在这一部分，威尔逊对毛最后 20 年的乐观观点使他这本书显得十分过时。他否定了人们普遍对毛 1957 年关于核战争后果的冷峻的评论所作的评价，他指出这种评价不公正；他把大跃进之后的产量下降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虽然“某些责任可以归诸毛本人的政策”；他暗示毛在 1961 年对自己的错误“小题大做”了；他起劲地评说了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的“色彩丰富的”语言——这些激进分子警告那些把持学校的资产阶级坏蛋：要用刺刀“挖出他们的脏腑”；他自始至终争辩说：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以及 1966 至 1976 年这 10 年中所有其他消极方面，都是林彪、江青和其他一些人造成的，毛实际上对这一切并不负有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威尔逊的上述这种见解的倾向性，由于我们可以不加考虑，所以比起他的叙述缺乏清晰结构这一点来，还是次要的。政治局势上的关键性转折点，以及毛本人生涯的关键性转折点，常常叙述得非常含糊，有时干脆避而不谈。关于 1959 年庐山上的对抗，书中只用一个段落平淡地加以叙述，段落末尾

写了这样一个结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如此广泛地在中国人民当中展开，使毛“激动了”。但作者并没有真正指出1959年或1962年的意义。

特里尔用了100页的篇幅叙述了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段时期。他的论述虽然比威尔逊的要简短一些，并且着力于渲染一种气氛或唤起一系列的印象，但最后确实提供了一个关于政治变化模式的较好的观念。

正如已经指出的，论述毛最后10年的长长的结尾部分，是特里尔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一般说来，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作者从头到尾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根据描述了一系列前后相继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高涨——林彪的失败——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困难、挫折和衰退的最后几年。整个说来，作者所采取的观点是清晰的、前后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毛主义的顶峰”，毋宁说是“一场温室中的游戏”。对于“造反有理”的口号，他评价说，“这是一种没头脑的理论，导致了没头脑的实践”。在与“滋生着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作斗争当中，“毛由于无法对付随着他所创造的制度而来的某些冷酷的事实，便虚构出了魔鬼”。尽管毛老是谈到群众，但就是他本人常常“绕开群众”。

在特里尔的这些见解中，有许多都是我同意的，但这些见解给人总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单薄而无说服力的。毛为什么能够这么容易地使群众支持长久造反的“无头脑的理论”？答案主要在于他操纵人民和政治体系的技巧吗？还是在于中国社会的某种性质助长了这样一种“温室中的游戏”？也许，特里尔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很明显地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了毛的精神状态上了。他对老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作了许多有价值的观察，但是，也许正因为这样，他这本书过于以毛为中

心了，结果未能向我们指出毛这个人及其事业的意义。倘若作者较多地注意一下毛作为革命的缔造者和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动力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本是可能做到的。

特里尔在结论中写道：“毛的矛盾……由于中国的变化超过了他本人的变化而加深了，因此，他与中国的动荡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这个憎恶旧事物的人，结果却执迷于一种别人已开始发现其陈旧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如果说特里尔对于毛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作为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家论述得较少，那末，他倒是时常回过头来讨论毛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他论证说，毛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为“孙悟空”，或者更明白地说，发展成了传统的中国统治者。然而，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毛一方面在晚年是一个秦始皇，另一方面，当毛在半个世纪以前分析中国社会的时候，他成功地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当他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时候，他成功地成了中国的列宁；当他“用瓦刀和砖块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时候，他成功地成了中国的斯大林。换句话说，就毛的灵魂而言，他毕竟主要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矛盾，由特里尔在书的开头提了出来：“本书致力于说明领导者应具的资质，在今天的某些国家里需要有人具备这种资质；本书同时还致力于促使普通人摆脱对领导者的神秘感。”也许，支配着中国人民自20世纪以来一直追求着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的，与其说是一种“领导者的资质”（显然毛是具备着这种资质的），还不如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合法统治者。但特里尔的表述的后半部分（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提得很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凡领导者必是神秘化的；我的意思是说，作为领导者的毛的角色，逐渐地采取了掩盖这种角色的性质的形式，这